

# 当代中国巨大规模人口的“整体现代化”〔\*〕

——组织政治学视角

常士闾<sup>1</sup>, 徐月<sup>2</sup>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089;

2.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讲到中国式现代化时,把巨大规模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如何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代化进程中的组织必须具有凝聚力和适应性,既拥有权威建立秩序,又能有效地促进各方面的积极性。中国在组织政治方面成效显著,其政治逻辑体现为:通过战略引领、政党统领、有效治理,以及文明传承实现了权威、秩序与活力的有机统一,从而为巨大规模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关键词〕人口;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组织政治逻辑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11.004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其中既有挑战的方面,即人口多,情况复杂、利益关系复杂、认同结构复杂;也有优势的方面,即人口多带来了规模效应,更大的劳动力参与就业规模效应、迅速扩大的经济规模效应、开放市场和贸易规模效应、最大资源消耗规模效应。<sup>〔1〕</sup>但这样一种优势并不是轻而易举获得的。从历史角度看,近代以来中国在上世界上就有相当的人口规模,但这些规模效应并没有发挥出来,为什么?从发展的进程看,美国是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国

家,现代化进程走了150多年(从1870年算起);如果从改革开放算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走了近半个世纪,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这样一个巨大规模人口的国家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再和印度比较,印度也是世界上巨大规模人口的国家,但发展的效应并不如中国。为什么在中国,巨大规模人口能够转变为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优势?在习近平总书记对巨大规模人口现代化的论述中,提到“我国14亿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sup>〔2〕</sup>这

作者简介:常士闾,政治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青学者、教授,原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资助的“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重点研究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端会议项目)(2023HY020)的成果。

既是对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经验总结,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的目标。如何“整体迈入”?靠什么?在当代中国学界各有不同认识,有的关注制度,有的问津治理,有的研究政治学,有的落在公民素质提升上,各种观点各有所依。在笔者看来,巨大规模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和组织政治有着密切关系。

### 一、何为组织,何为组织政治

在对现代化的研究上,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罗斯托曾经分析了现代化发展的几个阶段,总结起来看,他主要是从经济方面论证的,他的论证主要以美国为例。在这些论证中,他所推崇的是私有化和市场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此路可行吗?从狭义上看,现代化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和物质基础,诸如工业、科技等等,但现代化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涉及方方面面,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对人的组织也就成为了关键内容。在西方国家,对人的组织主要是通过市场、企业和市民社会组织实现的。在社会层面,各种微观的规则体系和宏观的法治体系,将社会成员纳入到了“现代化铁笼”之中。但由于原子式个体的存在、“自由”和“权利”的异化以及政治上的“对抗政体”的存在,使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面临着“组织失序”的问题。不少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殖民主义和后来的新帝国主义的影响,在发展上采取了资本主义方式,通过自发的组织,刺激本国的经济发展,藉此实现现代化。但从这些发展中国的现实状况看,其发展不仅跌宕起伏,而且最终陷入了“依附性”地位。上述观点都倾向于把制度视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不过在笔者看来,组织政治的逻辑不可忽视。

什么是组织?从广义上说,组织是指由诸多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相互联系起来的系统。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在其研究中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理论,其中他把组织看成是组合的系统或社会。<sup>[3]</sup>在对组织的认识上,社会学家韦伯认为,首

先,组织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是随机的,组织包括某些人和关系而不包括另外一些人和关系,组织是有边界的;其次,组织中的社会关系具有秩序性,这一特征使组织与其他的人的集合形式区别开来,组织会给组织内人际关系互动模式提供一个框架。这两个方面的特征使组织能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单位而行动。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联盟、开放系统等方面对组织的涵义进行了论证,这里不一一展开。上述对组织的认识和界定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的,其实,当组织基于人们结成的社会关系把一定的人吸纳其中时,它就有了政治的内涵。国内有学者曾著有《组织政治的逻辑》,分析了组织本身具有的“政治学”意义。<sup>[4]</sup>也就是说,组织是一个政治体系,内部由各种复杂的权力关系构成。组织就是指人们为实现一定的目标,互相协作结合而成的集体或团体,如党团组织、工会组织、企业、军事组织等等,无论是他们各自的内部,还是彼此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在一定的组织中总是存在着一个权力中心,各种权力关系围绕这一中心集合到了一起。基于这样一种逻辑,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组织政治学逻辑。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和观点,如硬权力的组织政治观、软权力的组织政治观、散布性权力的组织政治观,等等。从组织的结构和环境看,组织是一个有着一定权威支持的体系。这一权威可以对一定的资源和利益进行分配和组合。与其相关,涉及目标、权力、治理和文化等四大方面,凭借这些要件把周围分散的成员和群体编织到了一起。

在一个充满了利益矛盾的社会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机构:企业有企业组织及其机构,商会有商会的组织及其机构,政党有政党的组织及其机构,等等。而在众多的组织中,国家是所有组织的最权威的代表。从比较政治的角度看,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越是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政权在组织现代化上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随着发展起步时间的向后推移,

以强组织力的机构指导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强。在后发国家缺乏资本而又希望经济快速腾飞的情况下,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本投入到对国家发展具有关键影响的产业上。因此,国家需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和影响,与之相应地就需要对传统社会及其原生的关系进行改造。在这种状况下,国家建构、行政权力组织、执政党的作用就具有优先地位。联系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经验,这些国家能够在20世纪取得骄人的成就与此不无关系。

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个拥有一定权威支持的组织是取得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对此,政治发展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亨廷顿指出:“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在那么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存在着权力和权威的真空,可以暂时由魅力领袖人物和军事力量来填补;但只有政治组织才足以永久地填补这一真空。或者是统治集团在现存政治制度之内互相竞争以便组织群众,或者是异己集团组织群众推翻这个制度,二者必居其一。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sup>[5]</sup>亨廷顿对组织意义的分析具有相当的见地和价值。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组织的核心是政权建设,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意义,即组织具有政治的涵义,在这样的组织中,一定的权威既能建立起一定的秩序,又能有效地激发起社会发展的活力。

实现现代化一般有两个重要的途径,一种是通过市场的力量,利用社会内部自发的力量,通过逐步积累走向现代化。这种状况在早发的欧洲和美国存在过,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不过就是一贯坚持自由市场的英国和美国,也少不了利用政府的组织力量。另一种是利用政治的或行政的力量进行组织。很多早期的后发国家,包括德国、日本等均均是这方面的代表。苏联是另一种形式,是建立在经济集权和政治集权基础上的国家,计划经济和严格科层制构成了苏联推进现代

化的主要抓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后来却走向停滞,甚至国家失败和解体。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在竞争的世界中站稳脚跟,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力量集中有限的资源,组织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战略价值。可以说,对于处在各种不确定因素横生状况下的国家来说,没有组织的政治作用,是难以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上述三种情况中都存在着组织政治逻辑。同时我们也看到,弱组织政治下任凭社会自发发展,容易导致社会散乱,甚至发生动荡;强组织政治干预又可能导致发展的僵化,组织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现代化既是社会化大生产,同时又是全球性大生产,由此决定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组织必须具有凝聚力和适应性,既拥有权威建立秩序,又能有效地促进各方面的积极性。具体而言,组织政治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1. 战略引领。组织是通过一定的目标将各种力量集合到一起的。巨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需要多元的力量,但又要防止多元的力量各行其是,所以以一定的战略目标进行定位,是实现巨大规模人口向心运动的重要前提;2. 政党统领。组织拥有其领导核心,政党在组织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政党所拥有的特质成为吸引和组织各方面的重要力量;3. 有效治理。即发挥中央、地方和各个方面组织者和参与者的作用,以城市为中心,辩证地、有效地、科学地进行公共治理,及时处理巨大规模人口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不使这些矛盾和冲突影响到“整体”的行动,同时又能激发人们的创造力。4. 文明传承。通过传承文明秩序,形成一种向心性的中心纽带,把各方力量集聚到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规模人口国家的现代化,主要是在上述组织政治的逻辑中发展起来的。

## 二、战略引领:巨大规模人口行动的方向

如何使内部有着多元利益和复杂关系的巨大规模人口整体实现现代化,对此中国进行了自

己的探索和实践。中国是一个历来注重战略设计的国家,古代便有注重战略的金句: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样一个战略古训绵延流长。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这一古训的杰出继承者和发扬者。他们为中国的发展高瞻远瞩,为中国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同样也非常注重战略问题,他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sup>[6]</sup>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提出及其新时代布局,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构建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实践意义,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组织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和规划作用。

这里涉及对战略概念的理解。战略最早是军事方面的概念。战略的特征是指发现智谋的纲领。在西方,战略(strategy)一词源于希腊语“strategos”,意为军事将领、地方行政长官。后来演变成军事术语,指军事将领指挥军队作战的谋略。其涵义是一种从全局考虑,谋划实现全局目标的规划,涉及长远的规划、远大的目标,具有长期性。

中国是一个巨大规模人口的国家,人多力量大,但人多问题也多。人多的优势并不会自发形成,要使人多的优势发挥出来,需要对人多中的诸多问题进行合理解决。首先需要的就是理念、目标的设计,从而才能把分散的意志整合起来,使其朝着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方向前进。在中国,这个理念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西方的以“自由”为中心。后者建立在私有制和自由财产的运行上,前者注重的首先是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其集中体现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今天的国家建设,围绕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发展和伟大复兴,党的领导人都提出了重要的理论。从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正是在这些思想理论的影响下,国家制定了各个时期不同的发展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提出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有力地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组织和发展。

党不仅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而且也在这一伟大目标的引领下,分阶段具体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具体而言,各个时期制定的规划会化为各级政府的行动方案,通过各种政策和组织加以实施。在每个规划的制定上,向上与党提出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向下与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理想密切相联。这样,发展战略理念经过连贯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最终化为了人民的实践行动。现代化建设每前进一步,人民的美好生活便推进一步。巨大规模人口的整体现代化在一个个目标的落实和实现中逐渐建立起来。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从1978年到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71元增长到32189元,增长了187倍。<sup>[7]</sup>在1978年的时候,我国GDP才3678.7亿元,人均GDP才384.74元。<sup>[8]</sup>2022年我国GDP就达到121万亿元,约18万亿多美元。<sup>[9]</sup>显然,一个又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实现反映了新中国的不断由弱变强。

### 三、政党统领:巨大规模人口的组织者

在当代中国,如何把巨大规模的人口组织起来,克服复杂社会带来的非权威性和离散性,并使其能够富有活力,共同走向现代化,对于实现整体现代化至关重要,而这一组织者的角色非中国共产党莫属。

第一,精气神。精气神就是拥有一定的灵魂鼓舞,指永不懈怠、奋发向上的精神气质。这样一种精神气质足以影响和统领巨大规模复杂人口成员聚合起来。



今天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近亿。<sup>[10]</sup>各个地方和基层都可以看到党支部的存在和党员的身影。他们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组织整合作用。那么党员人数是决定因素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在当今世界上确实也存在着或存在过一些大党,如苏联共产党、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同样党员众多且深入社会。但苏联共产党随着苏联的剧变名落孙山;印度国大党内部派别争斗激烈,治理绩效低下;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70年后大权旁落。可见党员人数并非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党魂。这种“魂”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sup>[11]</sup>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想。在党走过的百年历史进程中,无数共产党人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这种信仰。尽管他们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一定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一代又一代人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作出牺牲,崇高的理想一定能实现。正是在这一精神的鼓舞下,党焕发出青春朝气,具有远见卓识、宽阔胸襟,以其昂扬的斗志和奋发向上的精气神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认同,因而使组织充满生机。

第二,大智慧。这里的大智慧就是对全局、未来的准确判断和灵活、科学、果断地处理复杂纷繁事务的能力。组织者只有具有这样的能力才能担当起对大规模人口整体现代化进行组织的重任。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传统文化中流传下来的处理内政外交的智慧和经验,深深地印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认知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智慧于一身,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内政和外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江泽

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开创性地解决了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主张。在这一战略布局中,中国没有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也没有继续步计划经济的后尘,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向富起来的转变。这种大布局彰显了一个大党的政治智慧。到了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加入到世贸组织中,中国与世界的互嵌加深,中国也开始由富变强。在新的历史阶段上,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已与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一倡议进一步扩大和夯实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赢得了空间,同时也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充满了活力。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大智慧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成就了这一大智慧。它有两个重要的方面:1. 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基于中国面临的社会发展状况、发展规律,以及世界的大变局制定大政方针。高瞻远瞩、科学预测,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及其有效的组织提供了理论和观念上的支持。2. 辩证法。如果说西方的发展源于古希腊时代建立的“形而上学”,即追求变化了的世界背后的“本源”或规则,这种对“本源”的探索表现出来的高傲和出世特点带来的是一种僵化;那么中国的发展恰恰得益于《易经》提供的“有机联系”和“运动变化”思想的启发,更得自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真传,以普遍联系和变化的观点认识周遭的世界、处理复杂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在组织现代化上的大智慧使其承担起了现代化组织者的重任。

第三,自身正。自身正体现在处以公心、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的精神和行为。即在组织巨大规模人口的整体现代化中,处在核心位置的领导成员以其道德楷模的作用,影响周围的人们。孔子谈到“政”时就明确指出:“政者正也,子率已正,孰敢不正?”<sup>[12]</sup>今天政治的涵义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蕴含的公共事务、众人之事、人民之事占凸显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及其“先锋队”的本质规定,决定了作为领导者、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在对巨大规模复杂人口的组织中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由此也决定了党本身严于律己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sup>[13]</sup>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问题得不到解决,自然影响到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尤其重要的是影响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党迟早要失去执政资格,组织也将走向涣散,现代化势必走向失败。

中国共产党狠抓自己的“身正”,“正”在哪里?从内而言,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全面从严治党,从根本上说要靠内因,同时也要靠外因促进内因起变化。”<sup>[14]</sup>强调内因的作用,重要的是内心的坚定强大。有了思想上的强大,才能够承担领导和组织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重任。而人民群众也从满身正气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看到希望,自觉地聚集在党的周围,同时,组织政治的逻辑才能得到极大地发挥。就外部因素看,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各种政策法规,藉此规范党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的行为,从而由内到外保持党的清正廉洁。

第四,基础厚。即指组织得以建立和发展的根基深厚。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能够将巨大规模人口组织到现代化建设中来,靠的是深厚的群众基础,也就是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在此同样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从党的宗旨上看就是人民至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求解放,本质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就是要使人民富起来。

具体到中国的现代化上,其原则和方向就是“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sup>[15]</sup>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的就是“人民幸福安康”,并将这一实实在在的目标化为了具体的行动,而亿万人民也是从实实在在的幸福安康的生活中认同共产党、跟随共产党。

另一方面从外部的组织上看,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已经细化到了一系列组织规则中。中国的国家性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都体现出了党和人民之间广泛而深入的联系。这些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不仅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而且也党所确立的战略目标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保证。除此之外,党员先锋队、党员志愿者也在各行各业中开展活动,与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交往交流,解决人民群众的各种问题。可以说,党和人民群众之间血肉联系构成巨大规模人口社会的纽带。

#### 四、有效治理:巨大规模人口内部复杂关系的协调

现代化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国家内部的结构关系在发生着各种变化,而且外部环境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这就需要不断地调整内外关系,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和矛盾,这里自然涉及治理问题。治理首先是以经验和现实为基础的。在当代中国,对巨大规模人口社会的治理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第一,以城市化为抓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拥有众多农业人口的国家,大量的人口居住在乡村。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居住在乡村。<sup>[16]</sup>从世界历史以及中华民族

建构的角度看,要实现巨大规模人口的整体现代化,提高城市人口比例具有重要地位,自然城市化在吸纳农村人口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变化对当代中国的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有效的组织。这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首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初是从农村开始的,正是农村的变革为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强大的基础;其次,人口流动,尤其是大规模的农业人口进入到城市和城镇,一方面极大地降低了农村人口的存量,对脱贫攻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伴随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城镇各项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伴随着人口的流动以及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各类教育体系不断建立和完善,劳动力的素质也得到了提升;再次,伴随城市化发展和乡村人口的变化,国家对城市和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些适应于现代城市和乡村人口治理的组织建立起来;最后,由于城市是一切现代化要素的集中地,抓住城市这一关键环节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人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多方面的质量提升。

第二,有机协调。对一个拥有巨大规模人口的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即在组织和管理一个人口复杂的大型社会时,一方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要从实际和变化了的情况出发制定政策进行管理;另一方面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和辩证性。具体而言,就是用一种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认识问题和安排事务,不为某些现成模式所拘束。这种治理方式在中国古代的智慧中就已经存在。《易经》作为“变化之书”(book of change),强调了一切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对策。其中的辩证思想对巨大规模人口的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两个文明都要抓”,在实现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不断地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不仅要利用资源,同时也要保护资源,抓好生态文明建

设;在实现共同富裕上,不仅汉族地区要富裕起来,而且要实行对口援助,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在构建经济发展格局上,既要发展外贸,也要推动内贸,即搞好国内国际双循环。总之,在巨大规模人口的社会治理中,要本着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的理念,充分利用中华大地人口优势和市场空间带来的巨大便利,以一种开放的和辩证的态度处理问题,在动态中求平衡。

第三,科学管理和大数据应用。在对巨大规模人口的社会进行管理时,人口的信息采集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自古就有对人口信息进行把握的传统。不过在传统社会中,对人口的管理主要借助于人工和行政的力量。现代化的发展为当代中国巨大规模人口社会的管理提供了各种便利的手段,主要体现在科学化、数量化、标准化等方面。具体而言,科学化管理主要表现为大量的信息录入及对人员信息的采集,集中体现在对居民身份关键信息的把握上。如通过一张居民身份证便可获知其年龄、教育、住址、婚姻、家庭等诸多信息。此外,科学化管理还具体体现在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数量化管理则是表现为更直接地将不同职业岗位上的业绩要求以数量的方式精细化出来。具体来说,社会中大多数工作人员需要满足一定的业绩要求才能获得薪酬和晋升机会,由此也就把不同的人员组织到现代化大生产之中。正是通过一定的数量化要求,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通过一代代人的工作数量的积累而不断向前推进。标准化管理则体现在各种规则标准逐渐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规则体系在各行各业的具体工作中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建立起来,从而保证一个巨大规模人口社会能够按照一定的标准联系在一起,组织在一起。在上述的科学管理中,现代大数据的运用极大地方便了科学管理的运行,为我国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坚强的技术保障。

第四,组织激励。组织激励是管理学中的重要理论。它指的是公司在组织制度上为员工参与管理提供方便,进一步激励员工的工作主动性



和创造性,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为每个岗位制定详细的岗位职责和权利,让员工参与工作目标的制定,使其在工作过程中享有较大的决策权。在当代中国巨大规模人口的组织中,企业组织的这种管理理论同样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组织中得到了运用。具体而言,巨大规模的人口分处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群体组织之中。从纵向结构而言,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在这样一种治理体制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联结一般通过一定的分工和科层机制来实现的。即使在企业组织中,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科层机制。科层机制宏观上把不同的人员划分在不同的层面中,在具体的层面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分工和岗位,从而形成庞大的组织网络。组织激励在此机制上展开,具体内容涉及以下方面:1. 岗位设定。根据工作目标、职能任务的需要设置不同的工作岗位;2. 明确责任要求。不同岗位有明确的责任要求,责任到人是重要原则。压实责任使在岗人员必须积极履职尽责,通过各个方面的责任机制,使责任人既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最终都要对人民负责。由责任体系编织起来的网络遍布于庞大的人口之中,从而将各方面的人员组织到了现代化建设中;3. 建立考核标准。每隔一定的时间对在岗人员进行业绩考核,由此决定人员的升降奖罚,从而激励在岗人员为实现考核中所规定的指标而努力工作。正是由于一定的考核机制的存在,从而保证了企业和组织的不断进步和持续发展。同时,也是由于无数个这样的组织和成员的努力,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得到了落实,从而在整体上也把巨大规模的人口转变为了实现现代化的优势。组织在这种激励中不断地获得发展,公民个人也在这种激励中得到了实惠,而人民整体也在这种变化中不断地接近了“美好生活”的理想;4. 建立民主参与和监督机制,激励员工和民众参与到组织中来,激励员工和民众的民主管理,同时也通过发挥民主监督机制,监督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保证组织的公正性和组织运转的高质量。

第五,德治与法治结合。中国古代就十分注重德治与法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德”涉及人们的内心世界,它通过一定的价值观念塑造人的内心世界,从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有耻且格”。“法”重在于“外”,即规范人的外部行为。在现代国家中,法治优于人治,法治也是国家整合人群的重要手段。面对人口众多且复杂的社会,通过现代法治,将公民组织到现代化建设中来,使人们能够在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下行动,既可自由地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又必须认真履行公民义务,从而形成一个有序的社会。

### 五、文明传承:巨大规模人口组织的精神纽带

当代中国巨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是在中华大地上展开的,历史文化基础和现代文明的联结,构成了组织政治的重要精神力量。在此有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方面是厚实的文化传统。什么是文化?人们有不同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文化是人们在与自然、他人以及自我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某种稳定性的观念、心理及各种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总和。它可以是无意识的、自发性的存在,也可以是有意识的、自觉的力量。二者相互借势沉淀于中华民族的发展之中,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文化可以通过某种仪式、礼仪、习惯、道德规范,即所谓的“非正式制度”表现,也可以通过宗教、艺术、哲学、法律、制度等形式表现出来,从外部影响着人们的心理、认同和行为,因而,文化也就构成了一种组织秩序。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文化中国”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与西方的民族国家或是中东等地的宗教立国精神不同,中国是一个具有浓郁的注重人文特点的国家。在这样一个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国家中,“关系”构成了一种文化。学者许倬云指出:“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以神为中心不同,中国文化以人为中心。但这个‘人’又与文艺复兴之后的人不同,不是超越了宇宙万物的孤独的、自主的个人,而是与天地同等的人。”<sup>[17]</sup>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肇始于商周时代,在儒、墨、



道、法四大家的思想中得到阐发,并在中国历代思想中不断走向精致化,由此也就汇集成为了思想文化传统,深深影响着对巨大规模人口的组织和管理。在这样一个以人文为特点的文化中,“结构文明”占有突出地位。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指出:“中国文化的本质在于所谓的‘结构主义’。也就是说,一切事务的意义——人、自然、艺术、生命——都不在于个体,而在于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之间的关系。”<sup>[18]</sup>“关系”构成了一个整体和秩序。它来源于农耕文明发展起来的人伦关系,但又不限于此,而是扩展于天下。从社会结构上观察,各种关系重叠,枝枝蔓蔓,从家及国,伸展到各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逐渐编织成了“民族”。不同民族之间长期交往,彼此镶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从而形成了“我们”,即包含有各个不同族群的“中华民族”。而运行其中的“和”的思想,把各方面因素联系在一起。“海权论”代表马汉指出:“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有着和为贵的思想。”<sup>[19]</sup>通过“和”不仅把各种关系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而且也使不同民族群体结合到了一起。显然,中华民族的组织逻辑不是宗教,也不是西方青睐的“民族”,而是一种“文明”。有国外学者指出:“中国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且是大陆文明。”在中国人的眼里,“‘中国’实则是‘中华文明’的同义词,包括诸如中国的历史、朝代、儒家思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家族联系和习俗、人际关系、家庭、孝道、祖先崇拜、价值观、独特的哲学体系……简言之,中国之万物孕育于中华文明。中国人并不像欧洲人那样将国家视为民族国家,而更多看作文明国家。”<sup>[20]</sup>在这样的国家中,“天下一家”,“以和为贵”,广交朋友,四海之内皆兄弟。有了这样一种精神哺育,“五方之民”汇集中原,凝聚成中华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国曾经历过大规模混乱、侵略和分裂,但其文明的延续性却得以维持,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sup>[21]</sup>

另一个方面是“大一统”的理念。在绵延几

千年的历史中,影响中国组织政治的是“大一统”的理念和传统。林尚立指出:“大一统是中国之轴,失去了大一统,中国也就失去了整体存续的基础与价值。”<sup>[22]</sup>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中,早已存在着“太一”的观念。《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的“大”字不是形容词“大”,而是动词“尊大”的“大”,“一”是元,“统”是始,“一统”就是元始,元始就是万物(包括政治社会)的本体。葛兆光指出:“由天地四方的神秘感觉和思想发出的运思与想象,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个原始起点。”<sup>[23]</sup>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中,人们从空间关系中推演出了中央和四方的关系。“一统”即指政治社会自下而上地归依于一个形而上的本体,从而使这一政治社会获得一个超越的存在价值,而不是自上而下地以一个最高权力为中心来进行政治范围的集中统一。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中,大一统体现出来的是人的社会存在、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以及传统政治体系三者的浑然统一。“既是政治的大一统,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进而也是人与家庭、与社会、与国家的大一统。”<sup>[24]</sup>它不仅构成了“文明国家”的核心,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一体”的重要体现。它通过“书同文”、儒家思想的传播和影响,乃至后来的科举制度等将中华文化体系根植于社会,在人的内心世界建立起了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和组织规则。它以“和而不同”为理念,较好地处理了一元和多元的关系。

上述两大方面对中华民族的组织具有重要的影响。前者构成了一种文化,与每个成员、每个群体息息相关,是中华民族基因;后者构成了组织文化的硬核或中枢神经,二者相互支持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延续和辉煌。

中国传统以人文为特点的文化受到农耕文明的影响。以家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的人伦关系和封建等级制结合,培育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进入近代以后,伴随着西方的个人主义、国家、民族以及民主等观念传入中国,古老

的文化传统和组织天下的方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中国的组织文化发生了新的转变。但经过先进的中国人的探索,尤其是经过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第一,人民至上理念构成了组织文化的价值基础。在新的理论和价值的引领下,中华文明中的大同社会理想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和文化。而人民至上理念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构成,“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主权”“人民共和国”为巨大规模人口的整体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政治组织形态,彻底改变了传统“民本”<sup>[25]</sup>思想的本质。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执政为民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实践已经嵌入到了党员干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认知之中,并转变为一种评判党员干部的重要标准,人民至上理念也为巨大规模人口整体现代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第二,天地万物和谐共生的理念为组织政治提供了基本的方向。发端于中国古代的天人相参、和谐共生理念在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扬光大。它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将人、自然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种理念也成为组织文化的重要内容。就中华民族内部而言,各个民族在保有各自文化特点的同时,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共同生活在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中。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和谐共生理念转变成为一种创造美好生活的力量,各个民族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通过自己的双手培育出一个绿色的、适宜人们生活和发展的美丽家园。和平、绿色、和谐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又提升了人们对自己所生活的这片土地的认同。就外部关系而言,基于和谐理念影响下的中国寻求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合作共生。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10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讲话中指出:“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

好,世界会更好。”<sup>[26]</sup>世界不同国家的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和平与安全的环境。反过来,中华民族自身的和谐发展也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是在全人类发展的大环境中,思考着人口整体现代化的组织和发展的。它与西方建立在自足的自我认同基础上的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德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韦伯在《文化的世界史》中评价中国文化概念的世界意义时指出:中国文化是不会改变的,几千年来,它不仅反映生活、自然和宇宙,而且梳理和调整三者关系。“西方的文明以理性掌控着‘此在’,无法通过‘此在’的各种力量反映出内涵丰富的生活。……掌权的统治者不再通晓自然性、人性与宇宙间的关系,也不再理解宇宙的规律。或者为了彼此间的争斗、或者为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他们醉心于利用诡计、压迫、机关枪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进行统治。”<sup>[27]</sup>

第三,国家推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巨大规模人口的组织需要文化上的传承,在当代中国,国家主导文化建设是组织巨大规模人口的内在要求。具体而言,国家推动各个层次的文化教育体系建设,促进文化普及和国民文化素质的提升;国家通过各个层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促进国民的思想道德觉悟的提高;国家推进各种文化工程和理论工程的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断创新;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不同思想的发展方向;国家不断地对领导干部和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等等。国家所推进的文化建设不仅守护了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得到了传承和发展,而且也使国民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素养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不断得到提升,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这些都为巨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源泉。

## 六、结 语

在一个巨大规模人口的社会中如何实现“整体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洋务运动掀起了中国现代化序幕,此后断断续续行走了近一个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掀起了新的篇章,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证。但采取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并不一定就能够带来良好的组织。苏联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组织方式没有充分地发挥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组织成为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中国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在党的领导这一核心力量的作用下,形成了向心而又充满活力的组织政治机制,通过战略引领、政党统领、有效治理和文明传承,有效地促进了巨大规模人口的整体现代化。

### 注释:

- [1] 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25页。
- [2]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23、31页。
- [3] 朱国云:《组织理论:历史与流派》,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页。
- [4] 杨占营:《组织政治的逻辑: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9页。
- [5]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82页。
- [7]《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87倍》,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712117340228660927&wfr=spider&for=pc。
- [8]《那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多猛?》,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751003470318053189&wfr=spider&for=pc。
- [9] 根据统计,美国2022年GDP总额为2547460亿美元,占世界GDP的25.08%,较上年同期的24.16%增加了0.92个百分点。中国2022年GDP总额为121.02万亿元,折合美元大约18.15万亿,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例由上年的18.37%降至17.87%,降幅为0.5个百分点。参见《2022年美国GDP 25.47万亿,我国18.15万亿,港澳台一起还能提升》,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758259796804778789&wfr=spider&for=pc。
- [1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 displays,截至2022年底,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804.1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06.5万个。参见《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9177.htm。

- [1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7页。
- [12]《论语·颜渊》,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82页。
- [13]《习近平出席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ldhd/2013-06/29/content\_2437094.htm? eqid=93c6bab9000516ad000000026456188f。
- [14] 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3年,第165页。
- [1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23年,第98页。
- [16] 1949年,我国农村人口约占90%,城镇人口仅占10.6%。之后城镇人口比例逐渐上升,到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数首次超过乡村人口。截至2021年底,我国城镇人口占比近2/3。参见《中国历年城乡人口比例(1949年-2021年)》,https://www.shujujidi.com/shehui/20.html。

- [17] 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导读”,第iii页。
- [18] [英]艾伦·麦克法兰:《文明的比较》,荀晓雅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第18页。
- [19] [美]马汉:《海权论》,一兵译,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年,第122-123页。
- [20] [21] [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0年,第162页。
- [22] [24]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第24、34页。
- [2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 [25] 中国传统的重民思想源远流长,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必须看到,这种思想是嫁接在君主专制基础上的。“重民”中的“民”只是臣民,“重民”的主体是君主,而不是民主。但从执政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重民思想有着积极的价值。
- [26]《习近平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0/content\_6909882.htm? ddtab=true。
- [27] [德]阿尔弗雷德·韦伯:《文化的世界史:一种文化社会学阐释》,姚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95页。

[责任编辑:刘姝媛]